

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新文学系列

1

= 主编 = 庄钟庆 = 骆明



新文学主潮论纲

郑 楚

新加坡文艺协会

“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新文学系列①)

新文学主潮论纲

郑 楚

新加坡文艺协会

“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新文学系列①) 庄钟庆 骆明 主编
新文学主潮论纲 郑 楚著 文学研究论著
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 2006年4月初版
ISBN 981-05-5612-8

新文学主潮论纲
郑 楚

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15N Lim Tua Tow Road
SINGAPORE 547751
Tel/FAX:62804630
2006年4月初版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75
字数:171千字
ISBN 981-05-5612-8
定价:新币 11.00 元

“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例言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给予巨大的助力，产生过不少影响。因此，研究中国文学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同时对推进新中文学交流及新华文学很有作用。

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及现当代文学（新文学）的创作及理论，也包括中国语言现象及语言理论。这些都是“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出版的内容。“丛书”要求有新的见解，新的表述，新的资料，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方法多样化。

“丛书”既需要自成格局的专著，也需要专题探讨的论著，同时也欢迎资料考证的专书。

“丛书”的出版工作由新加坡文艺协会主持，聘请庄钟庆教授（中国）、骆明研究员（新加坡）任主编，还聘请刘中树教授（中国）、万平近研究员（中国）及杨松年教授（新加坡）任顾问。

中国新文学研究天地广阔

庄钟庆

新加坡文艺协会主持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其中“新文学系列”第一集（以下简称“丛书”）五册即将出版。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丛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来说，受益不浅，至少为研究中国文学提供园地，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工作不断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中新文学的交流。

“丛书”突出的特点是几乎都涉及中国新文学的性质、主潮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近几年来再起波澜，有的论著已作介绍，不再重复。如何看待这些分歧呢？作者们的看法如何？

他们认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同五四运动的兴起分不开，是有一定的国际及国内背景的，这就是说，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而这些特点同国际、国内的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息息相关。^① 作为观念形态的新文学，必须反映当时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因之，他们认为中国新文学应是服务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的人民文学，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概言之，新文学是人民的文学。作者们又指出，新文学还具有现代性、民族性、大众性、多样性的特点。这就点明新文学的共性与个性。对此，作者

①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

们从几个方面进行阐发，如万平近同志的《新文学比较研究》从五四文学到延安文学的历程加以论述；郑楚同志的《新文学主潮论纲》，系统地论述新文学的主潮，指出新文学的主流、支流、逆流，及其不同作用；其他作者从新文学代表人物鲁迅、茅盾、丁玲等文学成就佐证了新文学的特点；还从新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说明中国新文学的威力。可见作者从不同侧面论证中国新文学的性质、主潮，颇有说服力。虽然说，这些结论不是全新的，然而在阐发时不乏己见。例如，关于五四文学主潮问题，通常认为是现实主义，作者却赞成这样的看法，认为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主潮，关于三十年代文学问题，作者在论及左翼作家文学创作时，不像有的论著那样只是笼统地说那是现实主义，而是明确指出从主体上说是属于革命现实主义，论及当时自由主义作家创作时，作者不像有的书的做法，把其中代表人物提升为民主主义作家，而是按照本来面目加以论述，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兴起的新人民文学，作者给予充分肯定，也恰如其分地指出其不足，不像有的论著那样或否定多于肯定，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论及四十年代九叶派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作用时，作者不同意将现代主义作为该派创作方法的主导，而是认为既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成分，又有现代主义浓厚色彩。

作者们敢于发表己见，如果说上面提出的看法是正面阐发，那么，下面便是他们在针锋相对中提出的。如苏永延同志以大量材料为据对非难鲁迅传统的倾向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提出鲁迅传统延续不断永放光芒的论断；又如陈天助同志于茅盾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指出“拒绝茅盾”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因为“茅盾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他的大批杰作的“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还将长久地教育和鼓舞着我国青年”。此文在《读书》发表后即被《茅盾研究》转载。他还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茅盾新文学精神的特点，并作了充分的论证。王丹红同志写的《丁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一书，从丁玲

作品中的母亲画廊入手，阐发丁玲在创作上的独特成就、价值及意义，其中部分章节面世后引起注意，陈明同志极为称赞，并向我打听作者情况。当社会上出现曲解丁玲时，她和苏永延同志曾分别撰文予以辨证，都受到某些刊物的拒绝，但有的刊物还是给予刊出，这说明坚持争鸣是非常重要的，唯有如此，学术才能发展、繁荣。

这几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多样化的。万平近同志以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新文学作家作品著称，在学术界颇有影响，这本书便是他在方面的研究成果；陈天助、王丹红、苏永延诸同志采用的研究方法，除了历史的、美学的方法外，还有近几年盛行的文学语言、比较文学方法，颇有新颖感；郑楚同志主要是采取历史的方法，论述问题有时代感。

几位作者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指导下，采用多种方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如何在见解上、论述上及表达上等方面更上一层楼，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丛书”无论是系统研究的论著，还是专题探讨的专书，都力求在内容上有新意，在研究方法上多样化，在表达形式方面有所革新，按照一般的常规，在表达方式上总是要求要有中心、有层次、有逻辑，不过在具体操作上，“丛书”的作者们各有特点，万平近同志的书用比较方法研究对新文学作家作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分析，不是一般的论文集，而是属于专题性的论集；陈天助、王丹红、苏永延三同志的论著，与万平近同志的带有专题性的书相似，然而同他又有不同之处，他（她）们以某一个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不同层面联系密切，各书可以成为独立的专著；郑楚同志的书与以上四位作者的书做法也不同，它是以新文学主潮为中心，按历史的发展论述，层层深化，自成一体，这几本书在体制上的新探索，有待进一步完善！

“丛书”的出版，表明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大有可为。以往已研

究的课题，可以重新研究，不过要用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如近年来盛行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丛书”多位作者采用它进行研究，颇有新意；在女性文学研究中，较少人探讨母亲形象，“丛书”中的作者注意到了，并作了论述，且有自己特色；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东南亚华文新文学是在中国文学，尤其是新文学的影响下逐步走上本土化的，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见，“丛书”几位作者有所论述，值得肯定。

“丛书”的作者成果可观，如万平近同志已出版过几部有影响的著作，其他几位学者出书前都在国内外文艺报刊上发表过论文，如《光明日报》、《读书》、《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及东南亚华文报刊，如菲律宾《世界日报》，新加坡《新加坡文艺》等，有些文章发表后还有一定影响。

“丛书”作者可谓老中青结合。万平近同志属于老一代学者，见解深思熟虑，行文老到，耐人咀嚼。郑楚同志属于中年学者，凝重扎实，时有己见，稳步前行。陈天助、王丹红、苏永延三位同志都是年轻学者，思想敏捷，善于发现问题，并能及时作出反应，且论述有一定的能力。他(她)们各有优势，互补性很强。希望他(她)们与时俱进，新成果迭出。

中国新文学研究天地开阔，研究队伍代代有新人，研究前景璀璨。

为了提高研究、编辑及出版水平，欢迎学术界及读者界提供宝贵意见。

新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关系

骆 明

中国自从推行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社会各层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文的写作就如江河决堤，一泻而千里，产生了许多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品，也创作了许多可读性很高的作品，而且这种活动，这种趋势，是越演越烈，越发展下去，成就越高，作家越多，好的作品也源源不断地呈现。

从这短短的近百年的活动中、演变中，看到的形势是好的，改变是大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白话文学，或许应该说，新文学运动并不局限在中国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其实，白话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给海外，给广大的海外的华文文学，海外的教育，海外的华人思想，带来了翻天覆地革命性的改变。

从一开始，从这种变革的趋势，从变革的潮流，由南来的作家，外传的报章、杂志、书籍等流传到海外。

于是海外就受到了这种影响，好的影响。

给海外带来变革，改变的渠道有：

- 1、是大众传播媒介；
- 2、是书刊等作品的感染；
- 3、是南来作家在这里办报纸，在学校教书、在副刊撰写文章等的影响。

这是外在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社会发展，这里的一些文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社会活动家，尤其是这里有影响的社会工作者，侨领等人的见识，他们的胸襟，他们的眼界，他们能接

受这些，他们敢接受这些，他们敢为之挺住，为之推动。于是，海外，尤其是东南亚，最少在新马这两个当时是英国殖民的地方，就生根了下来，就发展了开去。

南来作家不少，在我们几年前编纂、收集的《南来作家研究资料》一书中，所能知道的大约有 200 多位，能收到资料的也有 196 位。

从这里，也可以见到当时南来作家人数的众多，而且在这里的时间颇长，因此，在这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少了。

南来作家在这里写作、出版，对文学有作用、有影响；

南来作家在这里也培育、指导、训练了一些有兴趣于文学的年青人，热爱文艺，接触文艺，从事文学的工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新马两地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数不在千人以下；创作、结集出版的丛书也有为数万册以上，而且这种形式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发展的趋势。

在新马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在谈到新文学发展，在触及新文学起始的时候，总会说、总会承认新马华文文学是受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启示，受了新文学运动的催促、推动而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也可以较大胆地说：新文学对新马的影响是没有停息，从过去到今天，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在汲汲于追求，努力去达到。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这里的文学工作或文学创作的推动，也就不会从不间断地作下去。

这种关系是靠新文学的传播。

这种关系是靠新文学工作者的支持。

我们能接受，我们也愿意接受，我们将它当为养分、当成百用的有营养的食物，给我们不断地补充；

我们也接收了他们的一些思想、看法、资料、研究等做为我们的财富。

我们也在这里认真地研究、关心、注意，这两种文学，两个地区

的文学能够有怎样的关联，能有怎样的挂钩，有怎样的沟通，怎样的促进彼此的交流，从而产生对双方都有用、有影响的东西。

最近，我读了万平近研究员，郑楚副教授，陈天助、王丹红、苏永延等老师的专著。

从这里，又见到了新文学发展，推动，延续的轨迹，也读了、了解在新文学运动的进程中，有许多团体，许多作家，许多文学工作者、出版家、研究者们努力的面影；也见到了在各时期出现的作家，在主宰着、影响着、推动着各时期，各阶段的文学活动及创作的出版等。他们的这些工作除了丰富了中国的文学财富，也同样给有接触这种运动中发挥出来的受到好处，受到影响，受到帮助。

我们在这里，不只再见到鲁迅、茅盾、老舍、丁玲、巴金、叶圣陶、郭沫若、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也见到了赵树理、孙犁、肖军、肖红等在各个阶段的付出，其创作所得到的评价。

文学的影响不是一天的，也不是一时的，文学的影响是长远的。

文学创作的成就离不开在作品中表现作家的思想品德，因此，作家不只是个人的，还应该也应该有良好的心灵，有深远的见识，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作家的付出，在当时也许是见不到，是没作用的，没有影响，但是文学不是一天见效，一天就产生效用的。

因此说，有心的，有诚恳的，有愿意为人的作家，他将会在历久以后还被人提及、怀念，以及给予他们应有的评价。

这5部书，除了阐述新文学的传递，新文学运动及许多作家的成就以外，让我们重新复习、认识、了解，以为历久常新；更难得的是有几部作品谈及新文学及海外的华文文学关系。

这不只指出了与海外文文学的关系，也给我们一些新见解、新指引。

2006年4月8日

• 7 •

目 录

中国新文学研究天地广阔 庄钟庆(1)

新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关系 骆 明(5)

弁言 (1)

第一章 人民文学的形成

第一节 文学革命的发端 (3)

第二节 思想撞击与指向 (14)

第三节 一个主潮:现实主义 (21)

第四节 又一个主潮:浪漫主义 (48)

第五节 形式主义、象征主义的初现 (63)

第二章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

第一节 革命文学的酝酿 (77)

第二节 革命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85)

第三节 思想论争锋芒所向 (90)

第四节 革命现实主义的介绍与提倡 (99)

第五节 现实主义新特点 (119)

第六节 浪漫主义新色彩 (122)

第七节 形式主义、象征主义的发展 (127)

第三章 抗战文学的奋起

第一节 抗战文学的勃兴 (135)

第二节 思想论争的共识与歧见 (145)

第三节 革命现实主义新特点	(149)
第四节 现实主义新变化	(164)
第四章 新的人民文学的勃兴	
第一节 新的人民文学方向	(174)
第二节 思想斗争导向	(176)
第三节 革命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新面貌	(182)
结语	(197)
后记	(206)

弁 言

新文学主潮或主流可从几方面来论说：

(一) 从新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它是服务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的人民文学，经历着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和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新人民文学的阶段。

(二) 从新文学与创作方法、创作潮流的关系来看，五四时期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潮，逐步发展成为以革命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为主流。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在新文学的主潮中起着互补的作用。

(三) 从新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来看，新文学正确地处理与外国文学、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关系，走上了文学现代化(包括现代的时代精神、文学观念、作品内容及形式、表现手段及文学语言)、民族化(包括民族生活内容、文学形式、表现手法、文学语言)、大众化(包括大众及其生活斗争、形式、文学语言)及多样化(创作方法、流派、风格)的道路。

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早期开拓者的创作就具有现代化、民族化的特征；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苏联及西方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新文学进入新的阶段，即兴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确处理中外文学的关系，确认了文艺大众化方向，同时克服了“欧化”现象，促使新文学在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及创作多样化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四十年代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来，新文学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人民文艺运动中坚持现代化，着力提倡民族化、大众化、力求多样化，并且有明显的成就。

新文学主潮包括以上三个方面，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的。当然，也有主次之分。毫无疑问，有了人民文学的方向，又有了有利于体现正确方向的多样化的创作方法，还有了处理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正确观点与方法，这样才能使新文学走上正确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文学大道上不断发展。

新文学主潮或创作方法是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融合。如五四时期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导，象征主义、形式主义开始出现；左联时期是以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流，浪漫主义虽然在衰退，不过仍有活力，现代主义正在兴起中。

新文学主潮与个人多种创作方法的交织。如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主潮一致，但又采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手法，茅盾在左联时期的创作方法与当时革命现实主义主潮一体，不过又兼用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等表现方法。

新文学主潮与流派、风格多样性的统一。主潮与流派经常结合在一起，如五四时期的流派是同主潮是密不可分的，主潮或流派是由众多作家组成的，然而他们的各自风格并不一样，这就出现风格的多样性。

新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尽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交相辉映，然而却是以现实主义，特别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流，又兼有多种创作方法，同时流派、风格又是多样性的。

新文学主流是在同逆流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反对过复古派、鸳鸯蝴蝶派、民族主义派、“战国策派”、“勘乱文学”、汉奸文学等。

新文学主潮的形成与发展，同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学和传统文学分不开的，因而能使新文学走向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的道路。

新文学在世界文坛格局中占有特殊地位，它虽从世界文学中吸取营养，然而也给世界文学以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世界华文文学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章 人民文学的形成

第一节 文学革命的发端

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除了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外，也有不少偶然的因素促使事件的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发生正是如此。陈独秀和胡适从不打不相识，到携手高举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大旗，几乎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机缘促成的。1915年，在美国留学而一直关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看到《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上登载了谢无量的一首五言旧体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并附有加以赞扬的编者按语，他便立即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批评道：“足下论文已知古典主义当废，而独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也”。^① 不料，陈独秀不但不恼，反而由衷地邀请胡适一起来推动新文化运动。他回信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之事。《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学，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②

正是由于陈独秀这一诚恳的邀请，本来在美留学的胡适就深感祖国“言文不一”的现象，已经对文学革命的语言形式问题关注

① 胡适：《通讯》，《新青年》第2卷第2号。

② 陈独秀：《致胡适信》，《新青年》第2卷第3号。

多时了。于是他欣然同意陈独秀的建议，便把关于文学改良的八条意见，即“八不”写成《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独秀便把它发表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上。胡适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的工具已经丧失了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必须进行语体的革命。因此，他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提出改良文学应从“八不”（八事）入手的主张，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句。胡适的“八不”是从不同的角度针砭了旧文坛的流弊，并触及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文学的真实性与独创性，特别是文学语言变革的重要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文的立场。胡适很有远见地提出了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宣称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趋势。

胡适把变革语言作为文学改良的突破口，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正确选择。当时新旧文学争论的焦点是语言的文白之争，胡适文章的发表是恰逢其时，虽然他只是要求文学改良应着重于形式上改良，没有深入到内容上的革命，语气温和持重，但实际上还是起到了文学革命的“发难”作用，有着突出的功绩。有人认为这是时势造英雄，就不完全对。如果没有胡适的长期关注与研究，就是再大的机遇降临了，而英雄未必就能应运而生。

1917年2月，陈独秀为了声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立即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文学革命论》一文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接着，他进一步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并把“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立场。他的理论主张是：

首先，提倡建设新文学，反对封建旧文学。在内容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提倡“开发文明的民主与科学思想”。陈独秀从启蒙